

从史料“再出发”的当代文学研究

◎ 俞清瑶

摘要：“史”的缺失所造成的学科基本建设的滞后，是制约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一个瓶颈所在。吴秀明以历史小说为“根据地”，历经文学史研究、文学史料研究两次转向，其学术研究呈现文史互动的独特品性和追求。学者如何发挥主体独立性，在茫茫学海中寻找和建构符合自我个性、富有价值和研究潜力的“根据地”，吴秀明的《自选集》对此做了探讨，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当代文学研究 “建立根据地”“超越根据地” 文史互动

置身于茫茫学海之中，个体生命、学识的有限性与学术研究的无限丰富、复杂性之间的矛盾悖论，几乎是所有学者都会遭遇的普遍性问题。通过“掘一口深井”、以点带面的方式，进入到浩瀚无垠的学术场域，成为一种古今中外“通用”的基本治学理路。可以说，对于学者而言，寻找符合个人兴趣且富有学术价值和研究潜力的“出发点”，并以此建立“学术根据地”，具有战略意义。

“学术根据地”的选择，首先凸显研究主体之独立性。这意味着研究主体在众多研究对象之中，保持对作为个体的自我、整体性的学术场域及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清醒审视和总体观照；在此前提下，个体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突破其有限性，向无限丰富的学术领域“敞开”并形成良性互动，在环环相扣而又代代相续的“学术链”上做出属于自己的历史贡献。需要指出的是，“学术根据地”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学者对研究领域的故步自封。富有价值和潜力的根据地，首先意味着拥有纵向深入和横向拓展这两种向度上的弹性空间。因此，在建立根据地之后，还应认识到“超越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如吴秀明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所说：“超越‘根据地’就是打破现有恒定的秩序，使之处于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状态。”^①这就要求学者走出舒适区、摆脱思维惰性，重新进入具有摸索性质的“学术爬坡”阶段，实现“突围”和“飞跃”。这既是自我提升、超越现状的必经之途，也是学术研究不断深化和发展的水到渠成。

吴秀明以“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为其学术论文自选集命名，既投射出他一贯的学术主张——把当代文学研究从五光十色的观念海洋中剥离出来，返回“原点”重新“再出发”的当代文学研究思路，也是对自己数十年治学生涯的一次“自我盘点”。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中文学科下的一个新兴学科，现已经历了 70 年的风雨沧桑。从新中国成立后因被赋予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而享有特殊优待，到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黄金时代”的众声喧哗，至 90 年代以来的日渐“边缘化”，“当代文学”似乎未能真正经历应有的学科化、历史化的沉淀和积累阶段，完成与学科地位相符的学科基础建设。这使吴秀明产

生一种焦虑感和迫切感。当代文学学科的基础薄弱的现状,既源于其建立之初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化”定位,也与学科的“当代性”密切关联。“政治化”使当代文学研究长期处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解读与批评状态;而“当代性”所内含的文学现实与文学研究的同构性,又使批评的“海选”和“追踪”功能成为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动力。而正当90年代以来,整个中文学科趋于沉寂之时,部分学者发现了这一基础性问题,提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亟须启动新一轮的学术“转型”。吴秀明是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学者之一。^②近年来,他将研究重心逐渐转移到了当代文学史料工作上,并已取得引人注目的重要成果(这一成果,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一书)。

吴秀明向文学史料转移即是他“超越根据地”的结果,也是其学术兴趣和治学路径的自然延伸。吴秀明的学术研究起步于历史小说,并以此建立“根据地”;此后,又逐步拓展至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料研究领域。这两次转向,也可视为他对学术“原点”的“重返”。正是在这一“重返”的过程中,吴秀明为先前提出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史—学科史”的学术谱系找到了具有“原点”意义的一个重要环节——文学史料,再次理顺和完善了当代文学研究的逻辑链条。从吴秀明的学术转型,可见其学术兴趣的“变”中之“常”,即始终围绕“文学”与“历史”两个基点,进行建设性、体系性的思考和研究。文史互动的学术理念和治学路径,将历史的厚重底蕴融入艺术审美之维,使他的学术研究呈现出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互融互渗的特点。

需要指出,吴秀明的文史互动,既是其学术个性使然,也是他对当代文学领域“重论轻史”倾向的一种富有意味的反拨。中国传统的学问,以“义理”“考据”“辞章”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环境和现代学术制度下,传统的“大文科”“大文化观”逐渐隐退。当代文学研究“重论轻史”,不仅造成了学风浮躁,而且也使知识学养趋向偏至。80年代以来的“理论爆炸”又使这一学风延续至今。相比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基础史料建设,当代文学的“底子”过于薄弱。即使在今天历经70年,开始形成了某种相对稳定的知识谱系的情形下,史料滞后仍成为阻滞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的一个“瓶颈”。当代文学自有其特殊性。对于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永远处于行进状态的它,我们应该多一分宽容和豁然,不必急于衡诂。但无论如何,它不应成为我们放弃逻辑基点构建的理由。否则,很有可能造成研究的脱缰放马和主观随意。这关系到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公允性和有效性,也影响到学术创新乃至学科建设的长远未来。归根到底,学术研究不但需要观念与方法,材料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根基。正如陈寅恪所说,“一时代之新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而积极推进文学史料研究,正是对当下过分倚靠“观念”或“主义”这种理论批评方式的补正与纠偏。因此,在“历史化”颇为迫切的当下,吴秀明主张一部分学人从千军万马的批评大军中分离出来到图书馆、档案馆从事学科基础建设工作,在环环相扣的“学术链”中承担“这一代”应该承担的学术使命。毕竟,丰富、多样与多层的研究是营建良好学术生态、推进学科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使当代文学研究真正成为一门“学问”所必需的。吴秀明对当代文学进行“历史补课”的“吁请”即与此相关。

当然,对史料基础的重视和对实证研究的强调,并不意味着贬损批评与理论的重要

性。“整体性的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要求研究者建立以“史料实证”“作品解读”和“理论思维”为内容的“三元一体”的知识结构。^③而这也对文学研究的真实性、艺术性和思想性提出了综合要求：在肯定艺术逻辑的独立性和自洽性的基础上，承认“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或者说“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结合”；在推崇理论阐释的深刻性的同时，主张在更高层面上进行“事实”与“思想”的互动。在当前高扬理论和审美话语的文学场域下，重提史料对于文学研究的基础性价值，是推动研究进入更高水平、实现动态平衡的客观要求。当然，从另外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文学和文学研究是主观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史料当作文学研究的“工具”，也不应将文本降为实证研究的“材料”。与“为理论批评而史料”一样，“为史料而史料”也是不可取的，它不是并且亦不可能成为我们从事史料研究的目的。诚如吴秀明所说，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在史实还原的基础上表现出一种重绘历史的历史判断和意义指向”^④，或者如福柯所说，通过知识素养和理性认知使“文献知识”上升为“意义知识”^⑤，获取“再出发”的动力，才是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的现实意义所在。它则无疑对我们研究主体的史观和史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可以说是历史小说研究、文学史研究和文献史料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是吴秀明对其学术生涯的一次“自我盘点”，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与现实做了富有意味的概括。作为当代文学及其研究、教学的参与者，本书的编写是以对著者的治学理路和当代文学史具有双重回顾和总结之意义。在体例上，本书共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文献史料的研治与阐释”辑录了著者近年来在文献史料研究领域取得的学术成果，主要探讨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历史传统、现实境遇、基本内容等问题，从学科建制、文学教育、知识学养等多角度探讨文献史料的研究路向和价值意义。“文献史料研究”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年轻成员甚至新兴领域，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整体研究框范提出了调整的要求，这也为当代文学历史化、学科化奠定了切实的基础。中编“文学历史的编写与反思”从当代文学史的时空关系处理、整体性文学史的编写、文化转型与海外汉学等角度把握当代文学的内在特殊性和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外部环境变化，在兼顾历史逻辑和时代新质的基础上为文学史编写提供了新思路。下编“历史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则收入了历史文学的“作品论”和“形态论”两个方面的文章，包括对“新历史小说”“新故事新编”“反法西斯主题”抗战文学、领袖传记文学等创作现象的评价，并提出“历史小说真实的两度创造问题”“历史翻案的陷阱问题”“明清叙事”“影射”等问题，实现了从一般作品评论向形态理论建构的过渡。三编之间各成体系而又互为关联，在史料、思想与审美“三元一体”的动态平衡中体现出著者有关的“当代文学观”“文学史观”“文学史料观”。

吴秀明的学术研究起步于当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的“历史小说研究”领域，通过扎实的批评实践和知识结构的调整，搭建起一套系统性的历史文学“本体理论”。而此后的文学史研究，尤其是文学史料研究，也展现出相似的开拓性和建设性，使吴秀明的学术研究表现出体系性建构的开阔、大气与稳健。这要求学者拥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乃至进行学术冒险的勇气；而这也体现了“问学”之道与文学情怀的融合。《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一书是吴秀明对治学历程的整体回顾，也是将个人的“小历史”纳入当代文学研究

的“大历史”的独特尝试。有意思的是,全书上中下三编的整体结构采用“倒叙”形式铺展,使全书呈现为一场追溯学术“起点”的回归之旅;不能不说,这与著者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寻找“原点”这一学术主张构成了富有意味的巧合。

注释:

① 吴秀明、赵卫东:《超越“根据地”,走向更宽阔的领域——吴秀明访谈》,《渤海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② 参见吴秀明、赵卫东:《应当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兼谈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史料运用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③ 吴秀明:《批评与史料如何互动》,《文艺研究》2017年第12期。

④ 吴秀明:《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页。

⑤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7页。

(俞清瑶,女,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